

第三集

楚文化研究論集

楚文化研究会
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分类号 323083 K871.3-53
书号 31206 C896

第三集

楚文化研究論集

楚文化研究会 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

© 楚文化研究会 编

出版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027)5837093
责任编辑 徐德欢

印刷者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发行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张 14.125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插页 2
印数 1—2 170册 字数 339千字

ISBN 7-216-01356-5/G·326 定价: 12.50元

本书如因印制质量不合格, 由印刷厂调换

目 录

- 大河村类型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马世之 (1)
- 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何介钧 (11)
- 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 楚 文 化
- 起源……………高崇文 (24)
- 试论朱家台西周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谭远辉 (36)
- 早期楚民族文化的探索……………杨权喜 (48)
- 浅论楚文化的渊源……………赵世纲 (64)
- 楚初都丹阳兴衰考……………王建中 (74)
- 论湖南春秋楚墓……………高至喜 (92)
- 岳阳楚墓初论……………郭胜斌 (106)
- 鄂西北楚墓初论……………梁 柱 (117)
- 当阳曹家岗 5 号墓主身份研究……………高应勤 (132)
- 试论东周时期楚国东部地区的墓葬……………杨立新 (139)
- 楚铜器墓分期续论……………刘彬徽 (158)
- 试论楚带瓮墓……………曹传松 何建明 (176)
- 论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国别……………何 浩 罗运环 (192)
- 江汉地区原始文化和商文化时期的玉器……………郑 志 (206)
- 我国东周漆器的分区初探……………陈振裕 (214)
- 湖南楚墓出土的漆奁和漆樽研究……………黄纲正 (228)
- 战国楚墓所出“鸳鸯豆”定名新考……………张一兵 (240)
-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帛币”及有关问题研究……………周世荣 (249)

| | | |
|--|---------|---------|
| 楚贝币面文纪值论····· | 梅 凌 吕长礼 | (262) |
| 楚墓出土“罍床”研究····· | 贺 刚 | (277) |
| 试论楚墓木椁中的门窗结构及反映的问题····· | 王立华 | (306) |
| 从浙川出土文物谈楚国的经济····· | 张西显 张 伟 | (318) |
| 楚美术概说····· | 张正明 | (325) |
| 塑人龙凤翔舞与“箫韶”“大武” ——江陵李家台楚墓出土舞人龙凤纹漆盾初释 ····· | 院文清 | (336) |
| 楚绣艺术浅论····· | 袁建平 | (346) |
| 试论楚国人物龙凤帛画的艺术成就····· | 蔡全法 | (360) |
| 西周“南土”与“楚蛮之地”试析····· | 冯少龙 | (372) |
| 信阳地区春秋小国考····· | 左 超 | (380) |
| 陈楚关系及楚文化在陈地的发展历程····· | 韩维龙 | (390) |
| 试论“五溪”在楚国中的战略地位····· | 舒向今 | (401) |
| 安徽新出楚器铭文考释····· | 陈秉新 | (412) |
| 《楚帛书》与《天问》类征····· | 刘信芳 | (421) |
| 吴越文化与楚文化宏观比较····· | 刘建国 | (432) |
| 介绍吉林大学收藏的两件楚国青铜器····· | 王 丹 | (448) |
| 编后记····· | | (450) |

大河村类型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 马世之 ·

大河村类型是我国中原地区的重要原始文化之一，它同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后岗和大司空村诸类型一起，构成了著名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普遍分布于伊洛——郑州一带，洛阳王湾、涧滨、孟津波罗窑、小潘沟、临汝中山寨、大张、偃师汤泉沟、酒流沟、灰嘴、高崖西台地、巩县赵城村、密县惠沟、程庄、苇园、马鞍河、新郑唐户、荥阳河王、楚湾、点军台、秦王寨、郑州林山寨、齐礼阎、后庄王、大河村等遗址，均属此类型。在时间上，它晚于庙底沟类型而早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其主要文化遗存包括仰韶、龙山两个时期。第一、二期文化面貌与庙底沟类型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算作庙底沟类型的“东方变体”。三、四期同一、二期之间虽然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文化面貌方面也有某些前后承袭因素，但它们不属于同一文化类型，三、四期为大河村类型。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大河村三、四期分别在公元前3685±126年和前3070±210年（均为树轮校正值）^①。从其文化面貌考察，似与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楚文化的渊源问题，是学术界争讼颇多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诸种意见：一、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与楚文化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但关于屈家岭文化的形成，又有三种不同

^①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的看法：一曰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二曰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三曰由鄂东前屈家岭文化——螺蛳山类型发展而来。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虽然是由先于它的某种原始文化直接发展来的，但因为这里存在着三个关系密切的文化区，仰韶、大溪和螺蛳山类型文化，互相影响、融汇、渗透的现象比比皆是，得天独厚的屈家岭文化，是在吸收了上述诸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的。

二、楚文化的主源是中原地区祝融部落集团文化。“江汉地区是楚文化生长的温床，却并非其主源所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先后诞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似可从三苗的遗迹视之，却无由窥见它们与后来生长在江汉地区的楚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楚文化的主源决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①

三、楚文化渊源于商文化。郭沫若先生说：“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②胡厚宣先生主张：“楚国在文化方面犹有殷之遗风。”^③以盘龙城为例进行分析，可知“代表江汉地区的商代文化，就是先楚文化”^④。

四、楚文化是起源于周人老家的一种文化。从楚文化的发展历程看，“楚文化是在中原姬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它的诸多历史因素都来自姬周文化，迟至东周时期仍在很多方面带着姬周文化的影响，由此揭示出，楚与中原姬周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⑤。或谓“从考古材料来看，楚人应当是从西边——陕西或

① 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第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象考释》。

③ 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1辑。

④ 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⑤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25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山西周人的老家来的”^①。从上述各种观点来看，第一种意见虽然明确楚文化渊源于屈家岭文化，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屈家岭文化是由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看法。第二、三、四种意见，分别主张楚文化是在祝融文化、姬周文化和殷商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文化均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众所周知，殷商文化和姬周文化渊源于龙山文化，这同祝融部落集团的代表文化是一致的。如依文献记载将祝融谱系再往上溯，就是著名的颛顼集团，其考古学文化则非仰韶文化莫属。

关于楚的早期世系，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从颛顼写起：“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是和楚王同宗的贵族，他在《离骚》中追述楚国统治者的先祖时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是颛顼的称号。楚武王熊通生子瑕，受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即其后。屈子既以高阳苗裔自诩，表明楚之公族确认颛顼为其远祖。

颛顼之世处在我国哪个历史时期？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大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意见。一、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期或屈家岭文化中期：“颛顼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中原仰韶文化晚期过渡到龙山文化的中间阶段，亦即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中期。”^②二、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期或龙山文化早期：“颛顼、帝喾大概属于仰韶向龙山过渡时期，或者说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阶段。”^③三、龙山文化时期：“颛顼部落族属关系的复杂性，它所具有黄帝族与东夷族两个方面的

^① 王雄：《楚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② 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第1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第2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来源，至少可与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中含有东方典型龙山文化因素这一重要类型相联系。”^①此外，还有认为颛顼部落集团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②。上述诸说，大都是根据中国古代星岁纪年而推测出来的。据裴松之《三国志·魏志》引苏林、董巴上文帝表，《左传》及杜预注，过去均认为颛顼以岁在豕韦之年受命，岁在鹑火之年卒灭。不过“是项传说之来历及其虚实，虽似已经荒逸无考，但据星名‘豕韦’见在《左传》（昭公十一年），而《左传》所载岁星岁次，出自刘歆伪托，而苏、董表称，已属末世之文，而《左传》及《志》、《注》所见颛顼受命及其卒灭之星次，并不足征。”^③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认为，颛顼之世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及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期。说它为仰韶文化中期，似嫌过早；说它与“龙山期”相当，又失之太晚。因而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与大河村类型的碳测年代数据基本一致。

颛顼部落的原始居地，古本《竹书纪年》、《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都说为若水。《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因对若水、空桑解释的分歧，故在颛顼早期活动区域问题上的意见颇不一致。一般认为若水又名泸水，即今四川西北部的雅砻江。空桑即穷桑，在今山东曲阜附近。经当代学者考证，古代史书中所说的若水既不在四川，空桑也不在山东，二者地望均在今河南境内豫中地区。中国上古时代汝、若音同意通，二字之音同属日母，汝属

^① 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③ 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第126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鱼部韵，若属铎部韵，铎为鱼部之入声，鱼、铎二部本可对转。《庄子·渔父》：“吾语汝”，《人间世》又作“吾语若”。《齐物论》：“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耶？”注：“若、而，皆汝也。”《国语·晋语》：“命曰三日，若宿而至。”注：“若，汝也。”《管子·白心》：“吾语若大明之极。”注：“若，汝也。”《史记·齐悼王世家》：“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索隐》：“而及若，皆训汝。”《史记·张仪列传》：“始吾从若饮。”《索隐》：“若者，汝也。”《书·甘誓》：“汝不恭命。”《墨子·明鬼下》作“若不共命。”《汉书·匈奴传上》：“若肯发兵助我乎？”师古曰：“若，汝也。”看来若可训汝，故田昌五先生主张“若水即河南汝水”^①是有道理的。汝水是发源于伏牛山而流经临汝、郟县等地的一条大河。若水之“若”，或可作“洧”，郑杰祥据甲骨文“若”字的写法与“右”同，古右字与有、侑并通。甲骨文所载，无若水，有洧水。“有与右既是同字，是洧水也当即若水。”^②洧水今名双洎河，发源于密县西南、新郑县西北的山区，东南流经新郑县境，又东入于颍水。古“若”字之所训，究竟是“汝”还是“洧”，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大体而言，不出今河南中部临汝至新郑一带。

空桑得名的由来，《吕氏春秋·本味》载：“有侏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嫪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白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中州杂俎·空桑考》云：“空桑涧在嵩县南，有莘氏女采桑伊川，得子空桑，长而因水为姓。……嵩，古伊川地也。县之南有

① 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

② 郑杰祥：《夏史初探》第1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水曰伊，即生于伊上，因伊为姓者。水之南有涧，曰空桑，即伊女所化桑女得子于中者。”空桑是地名。《楚辞·天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归藏易》云：“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空桑涧因伊尹母化桑得名，位于伊水之滨，即今河南汝阳县杜康村西南一里许。另有城名空桑，《寰宇记》云：“空桑城在开封府雍丘县西二十里。”雍丘即今杞县。因而空桑地望也应在豫中一带。从颛顼部落的早期居地来看，基本上与大河村类型遗址的分布范围相吻合。

再就大河村类型遗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进行剖析，同样可以窥见它与颛顼部落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大河村类型是在继承了庙底沟类型许多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却受到大汶口文化较为突出的影响。如大河村遗址三、四期中的浅盘豆，Ⅰ、Ⅱ式背壶，敛口尊，敛口盃，Ⅲ式罐和Ⅳ式深腹罐等均属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陶器，几何形图案的彩陶纹饰，也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流域下游海岱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时代约当公元前4300~前2500年，被称为“东夷史前文化”。在古史传说中，东夷的先祖有太昊和少昊两个集团，还可能有蚩尤的九黎集团。其中关于少昊的传说最多。《左传·定公四年》讲述周初封鲁于曲阜的事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汉书·地理志》于东海郡郯县云：“郯故国，少昊后，盈姓。”在城阳郡莒县下说：“故国，盈姓……少昊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所指为少昊的司寇爽鸠氏曾居于齐都临淄。“故少昊集团及其后人实已遍布汶泗、沂沐、濰淄流域各小区。”^①唐兰先生主张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文化，此说多为学人所从。比较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少昊集团的代表文化为大汶口文化，或谓大汶

① 严文明：《东夷文化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

口文化主要反映少昊集团的文化，少昊与颛顼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说：“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唐兰先生说：“当少昊国家衰弱时，黄帝的后裔颛顼获得了政权，颛顼是在少昊国里成长起来的。”^①如若大河村类型属颛顼文化，其所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则有可能是少昊与颛顼两个部落之间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

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彩陶纹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文图像：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日珥纹、星座纹，以及演变了的太阳光芒纹（睫毛纹），全部出自第三、四期。经对第三期遗存出土的12片彩陶进行复原，可知原器物为钵，按口沿弧度计算出钵的口径和每个太阳纹的夹角（ 30° ），在钵的肩部一周原来绘12个太阳纹，可能表示每年有12个月份。太阳纹图案可分为三种：一、由圆圈和射线组成；二、由圆点和射线组成；三、由圆点、圆圈和射线组成。另外，在7片陶片上绘有日晕纹：中间为光芒四射的太阳，左右两侧绘有内向弧形带，带的外沿绘放射线。这种图像显然反映的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星座纹仅一例，绘于四期壶肩部的残片上，从残存部分看，是由3个或3个以上的圆点，用曲线和直线连接而成。可能是北斗星尾部的形象。彭曦通过对这些图像的分析，认为“大河村文化遗存中有关天文天象的彩陶图像，是我国氏族社会人人观天测地，个个关心‘天文’的极为珍贵的实际记录。从天文与农业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也是斯时农业有了相当进步水平的标志。除此之外，这组彩陶则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即当今河南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极可能是我国

^①唐兰：《中国有六千年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7年版。

远古天文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① 远古大河村人是关心天象、崇拜天体的居民。史乘所载，颛顼部落是星辰和太阳的崇拜者。《世本·帝系篇》云：“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僕。”张澍补注：“昌濮，《帝王世纪》作景僕，名女枢，是为阿女，所谓淳子也。感瑶光于幽防而生颛顼，见《含神雾》。”《竹书纪年》云：“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瑶光之星即北斗第七星。颛顼系其母感星而生，这是原始人类对天体崇奉的具体表现。此外，颛顼号高阳，很多学者都主张其神格为日即太阳。宿白先生早就说过：“颛顼即是高阳，高阳就是太阳。”^② 丁山先生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无疑说颛顼即是日神。……高阳，即是高明的太阳。”^③ 杨希枚先生主张：“据知颛顼号高阳，其义自即高高在天上的太阳。”^④ 田昌五先生也说：“颛顼就是高阳氏。也是崇拜太阳神的部落。”^⑤ 萧兵先生认为，颛顼崇日和太平洋文化区形形色色的太阳崇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楚辞》里潜在着一个太阳崇拜系统，《离骚》开章明义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充满着太阳崇拜的内容；也只能以‘泛太阳教’或‘太阳神文化’诸契机为钥匙，才能破译暗藏在屈原诗篇里环绕着‘太阳崇拜’或‘光明

① 彭曦：《大河村天文图像彩陶试析》，《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② 宿白：《颛顼考》，《留日同学会刊》第6号，1943年。

③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364~3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

④ 杨希枚：《论中国古代太阳崇拜》，《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⑤ 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崇拜’的秘密编码。高阳氏帝颛顼本来是东北夷的始祖兼太阳神，随着东方——南方的接触交流，被楚王族祀为先祖。《楚辞·大招》歌颂他‘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肠，东穷海只。’他像高踞太空的骄阳一般把太阳神文化的光芒广照四方，一直到海外。屈原是这位太阳神的精神后裔。”^①大河村出土彩陶纹饰中的天文图像，很可能同当时居住在这里的颛顼部落对星辰、太阳崇拜有关，它与《周语·国语》云“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的记述相符合。如果说大河村四期壶上的星座纹是“瑶光”的写照，那么陶钵上的太阳纹便可视作颛顼“太阳神文化”的标志。

大河村类型遗址中，普遍发现长方形连间排房基址，每间面积一般在6平方米左右，最大者达20余平方米，房基内设有烧土台与火塘，并发现有石斧、整瓮的粮食和成批的生活用具。连间排房是在单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住宅形式，它与单一的大房间不同，常常是两间或两间以上的多单元的并列成排建筑群。住宅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住宅内部空间分割和外部组合的日趋复杂，反映着居民生活私密性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也日益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在同一屋顶之下的居民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性质的一定的私生活禁忌。”^②连间排房这种新的住宅形式应为婚姻、家庭等社会关系进步的体现，标志着家庭已经成为独立起灶的社会最小经济单位。室内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粮食等，均为小家庭私有财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

^① 萧兵：《楚辞与神话》第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周星：《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①大河村类型连间房子的出现，表明当时中原地区豫中一带可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男子的社会地位已绝对高于女子。《淮南子·齐俗训》云：“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这种男尊女卑的情况，同大河村类型的社会性质颇有近似之处。

大河村类型同南方屈家岭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大河村遗址三期的圈足杯、四期的Ⅲ式鼎，与屈家岭遗址晚二期的Ⅰ式高圈足杯和Ⅳ式鼎相似，但两者的制陶质料不同，表明大河村的陶器是在当地烧制成的。《史记·五帝本纪》赋予颛顼以崇高的神力与灵性，称他是“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屈赋盛赞颛顼“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屈家岭文化器物在大河村遗址中被发现，可以从物质文化方面折射出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以往曾有学者撰文论证大河村类型为祝融文化，笔者亦欣然赞同。不过如从时代上进行深入考察，感到将它列为楚祖颛顼文化似乎更为恰当。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指出：“没有历史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单纯收集遗物的水平，因而永远存在着出现新古物学的危险。”^②我们通过对大河村类型的分析，仅仅是想从考古学方面探索楚文化渊源的一种尝试。如果我们的分析尚不致于背离历史事实太远的话，则大河村类型同楚文化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渊源关系。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1～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321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

· 何介钧 ·

自来关于楚族的族源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有：出自中原的北方说；出自淮夷的东方说；出自氐羌的西方说；出自江汉地区的土著说，也就是苗蛮说。

近些年来，东方说和西方说已逐渐趋于沉寂，而形成了北方说，即中原华夏说，与土著说，即苗蛮说的两军对垒局面。

由于历史记载和传说的纷繁，理解上又极多歧义，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终难取得共识。

细审华夏说和苗蛮说，都有可以立足的道理，但又都缺乏可以制服对方的铁证。

问题的症结是楚族与江汉地区土著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见诸于文献的“楚蛮”进行一番探究。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江汉地区，广义地说包括着豫西南，豫鄂陕接壤地带以及广阔的江汉平原。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此中的楚蛮，原是指民族。但这里似是指地区，即楚蛮民族所居住的地域，也就是“楚蛮之地”。

这段史料说明熊绎被封为楚子，居丹阳，其时丹阳地区属于“楚蛮之地”。至于丹阳的地望，有丹淅之会说，有枝江说，也

有秭归说。丹阳地望的歧见，不影响本文整体的立论，故可以不去探究，但丹阳应处于江汉地域范围之内，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楚的被封，按《史记》的说法，应是周成王时，第一个被封的是熊绎。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早于鬻熊时即已被封。清人宋翔凤在《过庭录》中提出：“毛诗序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鬻熊为季连苗裔，当亦南国诸侯之一，故先来事文王，其后仍其故封。”顾铁符先生在《楚国民族述略》中也明示了相同的看法，提出：陕西周原遗址甲骨中“楚子来告”的卜甲，据考证很有可能是鬻熊到岐山投奔周文王姬昌的原始档案。

不管是鬻熊始封，还是熊绎始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不是因为封了楚子，丹阳一带才被称之为楚，而是因为丹阳一带世为楚蛮所居，所封子国因袭该地民族（或地域）名称，取名为楚，因果关系，再明白不过了。

“楚蛮之地”决非局促于丹阳及其附近。《史记·楚世家》又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庸，《正义》引《括地志》：“房州竹山县”。扬粤，未有确说。鄂，一说为今鄂城，王国维说在武昌。句亶，《集解》：“张莹曰今江陵也。”越章，无考。这一次熊渠的大扩张，始自鄂西北的房县，直取汉水入长江的武昌、鄂城一线，南至大江。如果丹阳确指丹浙之会的话，那《史记》所注明的楚蛮之地，按最保守的推定，至少北到南阳地区，南到大江，西到鄂陕交界，东到江汉汇流。

既然楚国是因建于“楚蛮之地”而得名，那么，“楚蛮”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自然比楚国出现的时间更久远。在东周史籍中